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变迁研究

NONGYE XIANDAIHUA JINCHENG
ZHONG DE CUNLUO BIANQIAN YANJIU

张 红◎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本书获得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SH017）资助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 村落变迁研究

张红 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变迁研究 / 张红著.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109-19667-4

I. ①农… II. ①张… III. ①农业现代化-研究-中国②村落-社会变迁-研究-中国 IV. ①F124.1
②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2635 号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18 号楼)

(邮政编码 100125)

责任编辑 闫保荣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11

字数: 200 千字

定价: 30.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前 言

中国的改革确切地说是从农业改革开始的。30多年前，安徽凤阳18个农户冒着生命危险签订了土地包产到户的合约，这一行动标志着中国农村开启了现代化里程，为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促使传统农业向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方向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出台的11个1号文件，从不同层面提出了“三农”发展的重点、方向与支持策略，使得“三农”的发展活力明显增强，发展绩效逐步显现。但是，受制于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难题，仍然任重而道远。破解“三农”整体困局，尚需探索一套新办法、新途径。

本研究在西北地区选取了一组农业型村落，研究其在现代农业的背景下设施农业从无到有迅速培育起来并实现了可持续发展，从而带动了乡村社会转型和农民增收。这对于理解21世纪中国乡村变迁具有一定意义，至少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探索“新三农”融合发展的城乡一体化新模式。所谓“新三农”是基于未来农业如何做、职业农民谁来当、田园农庄怎么建而提出的，希望通过体制优化、制度创新与政策扶持，实现“现代农业、田园农庄、职业农民”的融合发展。具体来讲，现代农业就是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方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从而实现农业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信息化、机械化发展。职业农民是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达到相当水平后，伴生的一种新型职业群体，也是农业内部分工、

农民自身分化的必然结果。美国人类学家沃尔夫曾把职业农民与传统农民进行了比较：认为传统农民主要追求生计，是与市民身份相对应的群体；而职业农民则是充分进入市场，将务农作为商品产业，并尽一切可能使报酬最大化。由小农向职业农民的转化是大势所趋。田园农庄是农村城镇化发展新模式，“三农”融合发展的链接载体，美丽乡村、新型社区管理和示范推广的展示窗口。由此可见，“新三农”融合的实质是以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采取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农户主体，企业参与，协会互动的发展模式，全力推进农业经营规模化、社区建设庄园化、农民就业职业化。具体表现为五个特征：农业劳动生产率快速提升；农村城镇化质量显著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日益现代化；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产业交融互动明显增强；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持续凸显。融合中的创新，无论城乡，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都能获得均质化的服务供给。

第二，揭示作用于村落变迁的力量。从作用的强度看，尤其是在新生事物的起步阶段，制度力量的影响产生的作用要强于农业技术和市场力量。西村的设施农业从2008年开始起步，短短三年的时间里迅速崛起，与地方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和给力举措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作用的长期性看，政策制度与农业技术的作用力要远远弱于工商业的冲击。市场化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有的村民从事大棚种植，有的成为专职技术员，有的成为农民经纪人，有的成为专职翻土工，有的把眼光投向大棚建设所需的工业产品上，还有的村民从事运输、餐饮等个体商业服务性工作，村民顺利地进入职业转变的序列。当设施农业发展到了中后期阶段，政府会逐步退出转向提供公共服务。这时，决定新生事物能走多远就要看市场的发育程度了。从作用的深度看，农业技术对于村落的影响是深刻而全面的。尽管技术对传统村落的冲击力不足以与市场 and 硬性的政策制度相比，但从深度上看，其影响却远甚于后二者。

这是因为技术的进入，不仅仅使得村落适应了工业社会的逻辑，更重要的是影响了村民的价值观和惯习。由此看来，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村落变迁总体上属于外生型、有计划的社会变迁，系统内部还没有形成良性的动力机制和创新机制，制度设计也不健全。在此情况下，一方面需要依靠外力来推动，同时，应兼顾农民主体性的体现与市场运作的驱动性。最终由外力拉动内化为政府、市场、技术、农民四方自觉参与和良性互动的格局。

第三，对于现代化理论的反思。西方早期社会学家对现代性的研究一直遵循着“传统—现代”的理论框架，而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也基本上是以“二元论”的思想为基础。这种二元论的思维取向虽然有些极端，但其理论架构、分析取向与一些具体的研究结论仍对村落变迁研究具有很大的参考借鉴意义。在中国城乡关系的发展实践上，依据不同理论的指导，依次出现了以城统乡—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态势。以城统乡的做法，具有“二元论”非黑即白的影子，在实践中容易导致重城市轻乡村、重法治轻道德、重物质轻精神的做法，最终的结果是城市吃掉农村，近年来越来越少提及的新农村建设就是这种结果的反映。马克思的城乡融合理论指出，城乡的分离对立也就是社会的不协调，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未来的社会不是固化城乡分离，而是实现城乡融合。而要达到城乡融合既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也需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及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而发展的城市化来实现城乡融合。这一理论对于城镇化发展产生了极其积极的影响。而城乡融合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城乡一体化。我们认为，传统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现代性的发展，但却并不是没有可取之处，至少在满足人们情感需求、提供道德价值和维持社会稳定等方面依然发挥作用。传统—现代是一个动态的连续体，动态的社会结构变迁既包括现有城市的不断扩展与质量的提高，也包括农民自身的转变与发展，以及城市与农村之间相互作用

用与相互补充。在城市和乡村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城镇化过程中,会形成巨大的发展动力和发展空间,为个人与社区的发展转变提供更多的平台或机会。因此,没有必要简单地用现代性否定和替代传统性。可以通过对传统的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传统性适应现代性的发展要求,用传统性改造现代性的缺陷不足,或许可以是一个未来现代化发展的新思路。

最后,想说,愿尽绵薄之力,与其他有识之士共同展望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未来。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导言	1
一、研究缘起和意义	1
二、研究回顾与反思	2
(一) 国外学者关于现代化与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	3
(二) 国内学者关于村落变迁的研究	6
(三) 国内外研究成果的述评	11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主要内容	13
(一) 研究思路	13
(二) 研究方法	14
(三) 主要内容与相关概念	15
第二章 区域与村落背景	19
一、区域背景：黄土高原上的小村	19
二、西村历史溯源	23
(一)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25
(二) 生活方式与组织结构	28
第三章 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34
一、农业生产资料的变迁历程	34
(一) 耕作系统	34
(二) 作物栽培	35
(三) 化肥农药	35
(四) 水利设施	36
(五) 农业机械	37

二、设施农业的发展历程	37
(一) 设施农业起步	38
(二) 设施农业大发展	40
第四章 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社会基础	44
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发展	44
二、强农惠农政策与资本投入	46
三、大量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	49
第五章 农业科学技术的运作机制	51
一、农业科学技术的运作逻辑	51
(一) 政治化的运作逻辑	51
(二) 市场化的运作逻辑	55
(三) 工业社会的逻辑	56
二、农业科技的运作机制	58
(一) 土地、时间和技术	58
(二) 科技的进入	62
(三) 科技的获得与传播	65
(四) 科技的交流与更新	70
第六章 变迁中的村民与村落	73
一、村民价值观念的变化	73
(一) 职业观	73
(二) 闲暇观	80
(三) 消费观	84
(四) 乡土观	91
(五) 观念之变: 从价值理性到目的理性	93
二、家庭的变化	94
(一) 家庭劳动分工与技术决策	95
(二) 家庭关系的变化	97
三、村落的变迁	105
(一) 社会交往网络的变化	105
(二) 农业合作社的嵌入	110

目 录

(三) 市场的发育.....	113
(四) 村落社会结构的变化.....	119
第七章 村落变迁的意义阐释	129
一、农业技术与村落社会的互构.....	129
二、农业变迁与农民现代化	133
三、村落中的技术、国家与市场.....	139
四、村落共同体的命运	143
第八章 拓展性讨论	148
一、一个总结	148
二、进一步的思考.....	149
参考文献	153
后记	161

第一章 导 言

一、研究缘起和意义

40 多年前,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指出:“20 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 20 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①。如今这个问题摆在了中国的面前。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变迁的方式、速度、路径各不相同,所以,造成了不同的社会形态同处于一个时代的局面,这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观察变迁的巨大“实验室”。值得深思的是,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业已形成的传统村落秩序、生产方式、价值观念、日常生活等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面临怎样的解构与重构?这种解构与重构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乡村变迁的运行机制是怎样的?村落变迁的动力机制如何?推动村落变迁的内在主体有哪些?村落和村民是以怎样的方式来解读和吸纳现代文明的?国家力量、市场因素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影响如何?村落未来的发展趋势将何去何从?这些萦绕脑海的问题不仅需要从技术层面进行思考,更需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关注农业现代化与村落变迁的关系。

中国的社会发展主要是农村的社会发展问题,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主体内容也正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这不仅因为农村在区位结构上占据绝对数,而且因为农村村落社区作为相对于城市社区的特定生活空间,是农村广阔地域和历史渐变中的一种实际存在的最稳定的时空坐落,是在内部互动中构成一个个有活力的传承文化和发挥功能的社会有机体,乡村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从更深层次上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传统,任何细微的变化都显示着现代性因子在乡村社会中的扩展,乡村社会变迁实际上是一场由表及里的深刻社会运动。一个世纪以来,对于中国农村村落社区的研究始终是中国社会结构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②。

① [法] 孟德拉斯, 2005. 农民的终结 [M], 李培林,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

② 李善峰, 2004. 20 世纪的中国村落研究——一个以著作为线索的讨论 [J], 民俗研究 (3),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首先,本研究通过实地调查,分析探讨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变迁,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农业型村庄在农业变迁中的反应与变化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阐释了乡土社会面对现代化的进入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发生变化、如何发生变化、变化的结果等命题。具体来讲:在研究内容上,目前学界关于村落变迁的研究成果虽然建树丰硕,但将农业科学技术与乡村社会变迁结合起来的研究还很少,忽视了农业型村庄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反应与变化。另外,已有研究对村落变迁的考察,较多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结构要素的综合视角探讨村落变迁。这些研究以中国社会制度转型为背景,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村落变迁的规律提供了新的认识。本研究以农业现代化为社会背景,以西北乡村作为特定的研究场域,以农业技术为切入点,以现代化在乡村日常生活中的渗透与扩展为研究内容,来阐释乡村社会的变迁轨迹、变迁动力与发展趋势。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没有沿袭学界惯常的从政治、经济、社会、宗族等方面来讨论村落变迁的分析框架,而是沿着个体—家庭—村落—区域社会的逻辑思路,运用社会学的“质性研究”方法,即在自然情境下,对个人的“日常生活”以及社会组织的日常运作进行研究,并对被研究者的生活故事和意义建构做出解释。这一方法既避免了割裂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活共同体的村落之嫌疑,也可以动态地从描述个体开始,扩展到初级群体,直至辐射整个社会领域。

其次,在对调查资料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针对西部农村社区特有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区域经济特色、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等特点,将村落变迁的研究放在农业现代化这一大的背景下,通过客观描述与理论解释以期能为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借鉴,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提供现实指导。作为理论工作者研究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变迁,不仅是一种客观描述与历史记录,而且能为农村社会今后的发展指明方向,对于全面推进农村社会发展、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改善农民生活质量及其培育新型农民等,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与广阔的应用前景。

二、研究回顾与反思

20世纪初起源于美国的农村社会学传入中国,与当时的中国社会背景和“三农”境况一拍即合,引起了众多学者的高度关注并激起极大的研究热情,

产生的一批高质量、高水准的研究成果为农村社会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根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围绕研究主题,我们从“国外学者关于现代化与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和“国内学者关于村落变迁的研究”两个方面梳理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并进行了简要述评。

(一) 国外学者关于现代化与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起步较早,罗吉斯在其著作《乡村社会变迁》中,从职业、家庭等几个方面宏观地描述了乡村社会的变迁,从理论上分析了农村发展与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分析了制约农村现代化的各种因素。其中,作者用专门章节论述了新技术对美国农村面貌改观带来的巨大影响^①。

孟德拉斯的《农民的终结》以法国农村的现代化道路为背景,分析了欧洲乡村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变迁过程。书中分析了法国乡村在引入玉米技术后的情形,展现了农村在土地意义、劳动方式、知识习得以及农民意识方面的变化,最终传统的小农转变成现代的农业生产者。孟德拉斯笔下的“农民的终结”,并不是“农业的终结”或“乡村生活的终结”,而是“小农的终结”。在孟德拉斯看来,从“小农”到“农业生产者”或“农场主”的变迁,是一次巨大的社会革命^②。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若孟以满铁资料为基础,于1969年出版了《中国农民经济:1890—1949年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考察了从19世纪末期中国向西方敞开大门开始到20世纪中期社会主义胜利这段时间的华北农村。他对这一时期华北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非常肯定。人人都有权利和机会自由进入市场交易,没有任何个人或集团能以使用非经济力量操纵市场价格为自己牟利,这一点正是中国农业能最后借以市场经济获得发展的核心。他认为,发展中国农业经济的关键在于广义的技术进步,比如发展农业教育与科研以培育农业人才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建造基础性的设施便利农民进入市场,建立新型的农业金融机构使贫苦的农民也能获得生产进步所需要的资本等^③。

① [美] 埃弗里特·M. 罗吉斯. 1988. 乡村社会变迁 [M]. 王晓毅, 王地宁,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② [法] 孟德拉斯. 2005. 农民的终结 [M]. 李培林,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③ [美] 马若孟. 1999. 中国农民经济: 1890—1949年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 [M]. 史建云,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年鉴历史学派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的《法国农村史》，研究庄园制度的目的不在于了解中世纪社会生产关系制度本身，而是了解这种制度对法国中世纪以来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个人主义的影响。法国16世纪开始农业革命后，并没有出现大农场主的局面，占统治地位的是农民小土地所有制，是农民个人主义经营。土地形式上的传统主义、共同耕作方式对新精神的长期抵抗、农业技术进步的缓慢，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小农经济的顽固性^①。

施坚雅在集市社区范围内研究中国的村庄。于1964—1965年发表了《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他认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在村庄的狭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所在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基层市场满足了农民家庭所有正常的贸易需求，既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向上流动进入市场体系中较高范围的起点，也是供农民消费的输入品向下流动的重点。作为社会体系的基层集市是农民熟人社会的边界，农产品所需要的劳务和资金需求一般在这里得到满足。基层市场构成了通婚圈的范围并与农民的娱乐活动有关。复合宗族、秘密会社、庙会董事会等组织都以基层集市为单位，因而较低的和中间的社会结构形成了与市场结构平行的等级网络，集市同时也是沟通农民与地方上层交往的核心^②。

黄宗智认为，中国的小农经济阻碍了农村经济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华北农村，商品化完善和强化了小农家庭，因此促进了经营式农场出现的同时也阻碍了农场的发展^③。作者继而发现长江三角洲的农村经济是按照恰亚诺夫的逻辑进行，挑战了舒尔茨的“经济人”理论^④。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和《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较好地揭示了不同发展区域小农行为选择的差异。在黄先生看来，今日中国的农业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发展契机，其出路不必等待未来的更高程度的城市化，更不在于美国式的大农场，而在于当前新时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既是高劳动密集型的也是相对高收入的小家庭农场。

英国汉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于1958年出版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在方法论上强调中国的村落研究应该注意探讨国家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① [法] 马克·布洛赫. 1991. 法国农村史 [M]. 余中先,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② [美] 施坚雅. 1998.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 [M]. 史建云, 徐秀丽,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③ [美] 黄宗智. 2000.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M]. 北京: 中华书局.

④ [美] 黄宗智. 2000.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M]. 北京: 中华书局.

系。他对中国福建和广东省宗族组织的研究,主要是运用文化人类学的功能主义方法,重点探讨中国宗族的结构和功能。他认为水利灌溉系统、稻米种植与边陲社会三个变数因素成为宗族发展的重要动因。种植稻米而有农业剩余,可以容纳高密度人口的生长;水利灌溉的建立需要有更多劳动力的合作,因此促成土地的共同占有与宗族协作;在边陲地带的移民为防御外来威胁,很容易促成宗族的团结。在弗氏看来,在中国社会,宗族成立的根本原因是共同祖先的认定和共同财产的占有,而财产的分配在宗族内部是不平均的,这正是大规模宗族得以成立、发展的主要动力^①。

美籍印度裔学者杜赞奇 1988 年出版了《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该书探讨了中国近代国家政权建设背景下的“国家政权内卷化”和国家与村庄连接机制的变异问题,对华北的村落性质、宗族结构、国家代理人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他的研究挑战了施坚雅试图从村落以外的社会关系中分析社会组织原则,探讨地方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集市体系理论和分析模式。作者运用“文化的权力网络”概念探讨了村庄的政治权利与文化网络的脱节过程,分析了 20 世纪上半期国家在基层乡村丧失合法性的原因^②。

詹姆斯·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从农民的视角出发,运用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田野记录,论述了东南亚农业社会中农民的生存伦理与反叛逻辑。指出支配小农经济行为的主导动机原则是“安全第一、避免风险”,以及在同一共同体中,尊重人人都有维持生计的基本权利和道德观念。著述中提到,在严酷而强大的生存压力面前,生存取向和非利益取向,构成了农民社会理性与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之间的巨大差异,农民行为的首选目标是保障生存,而非利润最大化包括克服贫困。农民的行为取向和生存伦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技术的改进、更新,在最大程度的保障了农民生存安全的同时,也创造和维持了农民的贫困^③。

萧凤霞在《华南的代理人与受害者》一书中探讨了 20 世纪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改造,萧氏通过对乡镇、村社区的个案研究,指出在传统社会,中国的地

① [英] 莫里斯·弗里德曼, 2000.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 [M]. 刘晓春,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② [美] 杜赞奇, 1994.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③ [美] 詹姆斯·斯科特, 2001.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M]. 程立显, 刘建, 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方社区离中央权力机构行政控制中心较远, 具有较大的自主性, 当时的国家利用地方精英网络控制民间社会和社区社会。20 世纪以来, 国家的行政权力不断向下延伸, 乡村的权利体系已经完成了从相对独立向行政“细胞化”的社会控制单位的转变, 造成社区国家化的倾向^①。

阎云翔在 2009 年出版了《私人生活的变革: 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书中研究了一个以前从未被其他学者研究过的主题: 中国农民家庭生活中的个人与情感问题。作者以知情人的视角, 通过对父权衰落、青年自主权上升、爱情与亲密关系的发展、夫妻关系重要性的增加、隐私观念的兴起等主要议题的回顾, 总结了中国农民的私人生活经历了双重的转型: 私人家庭的崛起以及家庭内部个人私生活的普遍出现。并以空间居住布局为切入点, 呈现出一幅现代农村的情感画面, 从中国一个普通村庄的私人生活史写出了整个社会的变迁^②。

(二) 国内学者关于村落变迁的研究

自古以来, 中国就是一个农业、农村与农民占主导地位的社会, 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描述的, 从基层向上看,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③。这一论断, 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 都是适于中国的。但改革开放以来乡土社会的根基被动摇, 传统的乡村社会格局被打破, 农民从土地中挣脱出来, 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个全新的乡村社会规范和秩序正在孕育当中。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革始于 20 世纪初, 从那时起村落研究就开始引起学者们的思考和关注。

村落既是一个空间单元, 也是一个社会单元。早在 20 世纪初, 田野调查就拉开了序幕。1918—1919 年, 美国社会学家葛学溥带领学生在广东凤凰村进行家庭社会学调查, 1925 年出版了英文著作《华南的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社会学》。他是最早以田野调查的方式进入村落研究的学者, 该著作详细描述并分析了凤凰村的经济、婚姻、家庭、宗教、人口以及社区组织的情况^④。

① [美] 萧凤霞. 1989. 华南的代理人与受害者: 乡村革命的协从 [M]. 纽黑文: 耶鲁大学出版社.

② [美] 阎云翔. 2009. 私人生活的变革: 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③ 费孝通. 2005.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④ [美] 丹尼尔·哈里森·葛学溥. 2012. 华南的乡村生活: 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 [M]. 周大鸣, 译.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中国的村落研究从泛泛的“社会调查”,进入了一个规范的“民族志”研究时期。一批学院派的本土学者,在吴文藻教授“社区研究”的旗帜下,对村落展开了系统研究。

1935 年,林耀华出版了以结构—功能主义方法对福建义序家族村落调查的成果《义序的宗族研究》,以乡村社区的宗族为基础,分析了中国的宗族组织及其社会功能、宗族与家庭的连锁结构以及亲属关系的系统与作用^①。随后,林耀华通过对福建省闽江边两个家族,自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30 年代地方农业、商业、船运、政治、法律、教育、宗教以及民俗等多方面的社会文化生活的研究,完成了其代表作《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②。

以村落个案调查入手来揭示农村社会的变迁,是社会学的经典研究方法,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是中国个案研究的开山之作。1939 年,费孝通在英国出版了以江苏省吴江县开玄弓村调查为基础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通过对一个村落社会结构及其运作的描述,勾画出一个由各相关要素有系统地配合起来的整体,并试图从村落内部的社会结构分析中国社会变迁的动力^③。

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调查费时长达 8 年,内容涉及定县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组织、乡村娱乐、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对于当时农村状况有一个鸟瞰式的认识 and 了解,从文中表格里的数字可以发现诸多农村社会问题,从中得到分析社会现象的线索^④。它为研究定县及整个华北的社会概况提供了一条可供比较的基线,而且调查中所使用的方法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1984 年,黄树民教授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的资助下,到福建林村进行了田野调查,于 1989 年出版了《林村的故事:1949 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作为一部民族志著作,黄树民通过对林村党支部书记叶文德人生经历的描述,分析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过程中国家对村落政治文化的改造^⑤。

王铭铭在对闽台三村调查的基础上,在其著作《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

① [美] 林耀华. 2000. 义序的宗族研究 [M]. 北京: 三联书店.

② [美] 林耀华. 2000. 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 [M]. 北京: 三联书店.

③ 费孝通. 2001. 江村经济: 中国农民的生活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④ 李景汉. 2005.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⑤ [美] 黄树民. 2002. 林村的故事: 1949 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 [M]. 素兰, 纳日碧力戈,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